

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

1850年4月3日，洪秀全于广西桂平的平在山秘密地穿起黄袍，就任太平天王；同年11月4日，杨秀清于桂平金田村公开露面，执掌军权，聚集在金田、花洲、白沙、博白、陆川的各路人马同时揭帜，宣布起义；1851年1月11日，太平军各路兵马齐会金田，恭祝洪秀全的38岁生日，并以明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——这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，宣告了太平天国的诞生*。太平天国以建立人人平等，天下一家的太平世界为号召，向当时的统治者清王朝发出了强烈挑战。

太平天国的出现，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危机下的产物。

历史学界对于洪秀全登极和金田起义日期有不同的见解，这里所采用的只是其中的一种。

1. 社会危机日益严重

中英鸦片战争以前，中国社会的矛盾，尤其是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。北方以白莲教，南方以天地会为核心的人民群众斗争日益发展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，中国开始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战后十年，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，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形式。

第一，索取“战争赔款”。根据《江宁条约》，1842~1845年间，清政府向英国侵略者付出了2100万元的战争赔款。这一巨额负担，完全转嫁到中国老百姓头上。为了支付巨额赔款，道光皇帝公开发出命令，要各省总督、巡抚限期催缴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，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”。

第二，继续大量地向中国输出鸦片。鸦片战争后，鸦片走私进口不但没有被禁止，反而更加泛滥。外国侵略者通过鸦片走私大量榨取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。马克思指出：“从1843年起，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。”

1840 年进口 20619 箱，1850 年增加到 52925 箱。有人统计，主要由于鸦片进口，从 1843~1846 年四年之间，中国流出的白银约计 3900 万~4700 多万银元；1847~1848 年间，每年约计流出 1000 万银元。上海和广州成了两个最大的鸦片走私输入口岸。鸦片从广州沿西江而上，一直倾销到广西。梧州、平南、桂平、贵县一带，烟铺林立。桂平的大湟江口，一个小小的墟镇，就有鸦片烟馆十几家。吸食鸦片的主要是地主、豪绅、官僚等剥削阶级分子，他们为了购买鸦片，进一步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。

第三，倾销洋货。鸦片战争后的十年，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，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，一些手工业，主要是手工纺织业受到摧残，小生产者的处境更困难了。如苏州、松江一带，手工织布业，因“洋布盛行……是以布市销减，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，商贾不行，生计路绝”。广东顺德一带，织布手工业，也因洋布“贱售，女工几停其半”。

这三种掠夺形式，说明鸦片战争后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不是采取战争手段，而是采取经济手段掠夺中国人民。他们利用从腐朽的封建政府手中取得的特权对中国人民进行剥削；

或者通过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的手，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，其结果就是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进一步压榨广大农民群众。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沉重，土地集中急剧发展，城乡失业流亡人口大量增加。1845年前后，甚至远在西南的贵州省黎平府属各地，也由于“佃户分租无多，而田主盘剥日甚，以致富者益富，贫者益贫”。“民穷财尽”，其结果就是原来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，群众性的斗争汹涌澎湃，此伏彼起。统治阶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：“各省抗粮抗租，拒捕伤官之案，层见迭出。”某些清朝官僚也认为，1842年1月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，1844年7月湖南耒阳杨大鹏起义，1844年5月台湾嘉义县郭崇高起义，1845年10月浙江奉化张名渊起义，“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”。起义烈火点燃在全国各地。在北方，以捻军、幅军为主体的斗争遍及山东、河南和安徽等广大地区。据记载：“道光二十七、八年，沂、曹间号幅匪、捻匪者，所在蜂起，北至赵、魏，南及淮、徐、沂之兰山尤盛。”在南方，广西、广东、湖南一带的斗争最为激烈。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，有人向皇帝奏报：群众斗争“自直隶、山东、河南及浙江、两湖等省……几于无处不然，而最多且甚

者，莫如两粤”。

2. 两广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之一

广西群众性的斗争“日甚一日”，农民哄然弃耕相从。1848年罗亚丙攻大乌，张钊克三水。1849年李沅发率众起义，打下新宁县城，杀死县令，进入广西。这些起义的性质，可以从李沅发的“自述”中看出。他说：“我向来在外游荡，并无田业。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内，本境雨水过多，谷价昂贵，富户不肯发卖，本县并不劝谕减价，又不开仓平糶。士绅只把宾兴义谷出借，为数不多。八月收获后，又勒索重利，贫民无力偿还。我乘人心不服，起意抢夺，与谢有兴、刘复倡即刘八们大家商议，兴立把子会，结拜弟兄，可以邀约多人，劫富济贫……约定十月十三日夜起事。三更时分，聚众三百多人，先在东门外放火，烧毁文昌书院，是卢万先们打开东门，我们一同拥进，先到监狱，毁门进内，把杨倡宝、李世英放出……把万知县戮死。”他又说：人民群众拥护他，在他的周围集中了二三千人。“我因人数已多，又设立十行名目，一人管带十人，

添造各种旗帜”。他还说：“我实因结会劫富济贫，后因戕官，才起意谋反。”

两广地区激烈的反抗斗争具有多方面的原因。

和全国一样，两广的封建剥削十分沉重。以广西为例，浔州府属的平南县有一句流行的民谣说：“江北张其耀，江南满国球。”意思是说，全县多数土地被这两家地主霸占了。鸦片战争前，这一带的地租剥削率是“百种千租”，鸦片战争后，没有几年猛增到“百种二千租”，增加了一倍。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陷入绝境，“鬻及儿女者，往往有之”，“民饥死无数”，甚至出现“屠人鬻于市”的惨剧。

两广，有良好的革命传统。秘密抗清组织天地会自清初以来一直活跃在粤桂各县。在两广，还有良好的地理条件，特别是广西，山多林密，有利于积蓄革命力量，待机而发。这样，在外患内忧日益严重的形势下，群众性的反抗斗争发展很快。当时的记载表明：在广东，人民斗争“无时不有，无地不有，而莫盛于今日”。1844年秋间，有人到“香山之港口、隆都各乡，诱人入会，始犹数十人，于夜间结拜，后竟数百为群、公然白昼结拜。其结拜之处。凡有路口。俱用枪炮把守，以防官兵

围拿……衙门兵差，皆其党羽……不特外府州县勾结拜会者不可胜数，即省城白云山近在咫尺，亦无时无匪拜会”。在广西，天地会“根蒂过深，梗顽不化……成群结党”。

广州，当时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前哨。鸦片战争后，广州地区人民的抗英斗争并没有停止。1842年12月，英国侵略者抢夺中国商贩的货物，并开枪打人，愤怒的群众包围了英国侵略者，并放火焚烧了商馆。1844年英香港总督德庇时（J. F. Davis）欲强租广州河南地区，广大群众进行了英勇斗争，侵略者被迫暂时停止了租地活动。1849年，英新任香港总督文翰（S. G. Bonhan）率领民船进入省河，妄图闯入广州。居民闻讯，群起反对，旬日之间聚集十万多人，“省河两岸义勇，呼声震天”。文翰望而生畏，见势不妙，暂时打消了入城的念头。在两广人民反侵略斗争中，由于清朝统治者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屈膝求和，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，也愤怒地卷向他们。英国侵略者勾结广州知府刘浚，企图混进广州城。群众烧毁了刘浚的衙门，把他的衣箱放在大堂下面，并打开箱锁，“搜其朝珠公服而焚之，曰：‘彼将事夷，不复为大清官矣。’”刘浚自后院破围墙仓惶而逃。广东人民

的反侵略斗争，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，有力地推动了两广地区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。夏燮在《粤氛纪事》中曾经说到当时在广东流行一首民谣：“官怕洋鬼，洋鬼怕百姓。”他说，这样一来，官府没有办法统治老百姓了。

当时，整个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十分腐朽，广西官府的统治力量更为薄弱。金田起义后被清政府派到广西做巡抚的周天爵无可奈何地承认：省城里只有八九百名懦劣的士兵，藩库里只能拨下朝不继夕的军饷，全省地方上都是求参不得的官员，军队里都是贪生怕死的将官，就连公文案牍中所反映的也尽是被杀被焚的情况……做过周天爵幕僚的严正基更进一步地揭露了广西财政的极度恐慌，他说：广西规定征收的钱粮，每年只有 40 万两稍多，本省绿营的兵饷每年就需 42 万多两，已经是入不敷出；其他如关料杂税加起来不过 10 万余两，用来支付文武员弁的薪俸和其他开销也不够用。以前征收足额的时候，还需要外省拨款接济，这几年“盗贼”充斥，人民离散，除去减免缓征之外，每年完纳的只有十之五六，愈加感到不够用了。

人民群众活不下去了，他们普遍地进行了

反抗斗争。旧的统治秩序也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，一位广西籍的官员在言谈中流露出对家乡前途的忧虑，他说：广西近来的情事，就好像人满身疮毒，脓血所到，随即溃烂……不要说那些潜伏在草莽之间的“盗贼”们试图得逞，就是平常无事的地方，也有可能乘间起事。我听父老们说起这些事，不免为家乡感到担忧，真不知什么时候才是了结！

一场大革命的风暴，已经是强弓满弦，一触即发。

二 拜上帝

——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武器

1. 洪秀全开始拜上帝

洪秀全原名火秀，族名仁坤，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（1814年1月1日），出生于广东花县西北福源水地方的一个农民家庭。后来全家迁居官禄埗村。幼年时代他在私塾读书习字，接受传统的文化教育，五六年间，已能熟读四书、五经、孝经及古文多篇。后来他自己阅读中国历史和其他书籍，都能一目了然。秀全16岁时，因为家计困穷，不能再供他读书求学，他就和其他农村孩子一样，帮助家中干农活，或到山野去放牛。18岁时，他担任了本村的塾师。

洪秀全长期在农村生活，又亲身参加过农业劳动，接近贫苦农民，对他们的疾苦有较多

的了解。因此，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广东是中国人民开展禁烟斗争最激烈的地方。两广又是天地会武装抗清的活跃地区。这些因素也对洪秀全的思想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。洪秀全曾说过：我虽然没有加入三合会，但经常听说它的宗旨是“反清复明”。这种主张，在康熙年间三合会初创时还是不错的，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，我们可以仍说反清，但不可再说复明了。他和他的族弟洪仁环在一起议论时势时，慷慨激昂，“独恨中国无人，尽为鞑妖奴隶所惑”。他还说：每年将中国的几千万金银化为烟土，将人民的数百万脂膏收为花粉，一年如此，年年如此，至今二百年。中国人民的富有者怎么可能不贫穷？贫穷者又怎么可能守法？讲到这些地方，洪秀全感慨万千，“拍案三叹”。从他个人遭遇看，从十五六岁开始，即应考秀才，但是，在腐朽的科举制度下，他十年寒窗，最终一个秀才功名也没取得。这一切不能不激起洪秀全的反抗意识。1837年他又赴广州应试，初考时他的名字还高列榜上，但到复考时又落第。屡试不中，洪秀全受到极大打击，积愤成疾，猝然病倒，被人用轿子抬回老家后，一连40余日卧床不起。大病中，他梦见一位老人给他一柄剑，叫他铲除鬼魔。

他对父亲说：“天上至尊的老人，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，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。”他病中吟诗道：

鸟向晓矣必如我，我今为王事事可。
身照金乌灾尽消，龙虎将军都辅佐。

又一首：

手握乾坤杀伐权，斩邪留正解民悬。
眼过西北江山外，声振东南日月边。

展爪似嫌云路小，腾身何怕汉程偏。
风雷鼓舞三千浪，易象飞龙定在天。

他自己也在这个时候改名为“秀全”，此二字拆开为“禾乃人王”，借“禾”为“我”，意即“我乃人王”。显示了他强烈的帝王思想和反清意识。

但是，这时洪秀全的思想还有些动摇不定。他自幼深受功名思想熏陶，很难一下子与读书入仕的道路彻底决裂。1843年，洪秀全又到广州应试。这是他第四次到广州考秀才，也是最后一次，结果又是失败而归。他很是气

愤，到家以后，愤愤地说道：“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！”

就在这年夏天，洪秀全仔细阅读了 1833 年在广州街头得到的一本（劝世良言）的小册子。《劝世良言》宣扬西方基督教，称上天只有一位独一真神，那就是“上帝爷火华”（God Jehovah，今译为“上帝耶和華”）。所有富贵光荣，皆由之而下来，亦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。“神爷火华曰：除我外而未有别个神也”。

洪秀全是熟读中国儒家经书的，他根据儒家经典，验证了《劝世良言》所宣传的“独一真神惟上帝”的思想。洪秀全说：“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，考中国番国鉴史……俱是同行这条大路；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，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，致被阎罗妖所捉。”洪秀全这些话，并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在先秦时代，“皇”和“帝”只是至高无上的天神的称号，人间的君王是不能称“皇”称“帝”的。到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以后，他认为“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，传后世”，才决定把“皇”“帝”二字结合起来，成为最高封建统治

洪秀全获得（劝世良言）的年代，诸说不一，本书采 1833 年说。

者所独有的称号。

洪秀全还说：“看见其书说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，人人皆当敬畏他，崇拜他。至于世间所立一切邪魔该杀。”马克思说过：“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，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。”在天国，只有皇上帝才是真神，其他都是邪魔；在人间，最高封建统治者僭用“皇”和“帝”的称号，那当然是“妄自尊大，自干永远地狱之灾”，当然就是妖魔，就该打倒了。洪秀全接受了《劝世良言》宣传的基督教的“独一真神惟上帝”的观念，作为向封建皇帝斗争的武器。《劝世良言》促进了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发展。

2. 洪秀全、冯云山宣传拜上帝

洪秀全按照《劝世良言》中所说的仪式自行洗礼，皈依上帝，并积极宣传拜上帝。首先信教并接受洗礼的是他的堂弟洪仁玕和表弟冯云山。冯云山，广东花县禾落地人，生于一个“家道殷实”之户，自幼熟读经史、天文、历算、地理、兵法之书，成年后，家道中落，几次参加科举考试，也是“屡试不第”，后便在农村私塾教书为业。洪秀全根据拜上帝教义，

把自己家中所供奉的偶像牌位去掉。1844年，洪秀全和冯云山又拿掉村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。这一举动引起一场风波，洪秀全也因此丢掉了村塾先生的教职。

1844年4月2日，洪秀全、冯云山离开花县家乡，到广州、顺德、南海、番禺、增城、从化、清远、英德、曲江、阳山、连山等地宣传拜上帝，沿途贩卖笔砚以为盘缠。5月21日到达广西贵县的赐谷村。洪秀全有位表兄住在那里。洪秀全和冯云山在赐谷村一带传教，发动群众，可是效果不够理想，信教受洗的只有一百多人。

9月5日，冯云山离开赐谷村到紫荆山区，深入广大贫苦劳动人民中间宣传教义。

紫荆山区极其偏僻，群山环抱，形势十分险要。此地居住着十分贫苦的劳动人民，包括农民和烧炭工人。在冯云山来到之前，曾经发生过以农民为主，并联合其他劳苦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斗争。也就是说山民们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；并且由于他们缺少文化，比

洪秀全等人所宣传的“拜上帝”，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有很大差异，本书也因此不把他们的宣传活动简单地看做基督教的“传教”活动。

较迷信，易于接受宗教宣传。因此，从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看，紫荆山区是比较理想的积聚革命力量准备发动起义的基地。1844年10～11月间，为了发动群众，冯云山深入紫荆山区古林社，脱下长衫，亲身从事体力劳动。他通过做短工、捡卖牛粪等等接近广大劳动群众，宣传拜上帝。1846年春，冯云山又到大冲一面教书，一面继续传教。

1844年11月18日，洪秀全离开赐谷村回到广东家乡，仍以教书为业。在1845～1846年间，洪秀全写了《原道救世歌》、《原道醒世训》等著作，比较系统地阐发了他自己所理解的拜上帝教义，宣示其建立天下一家的太平世界的理想。

《原道救世歌》提出了“开辟真神惟上帝，无分贵贱拜宜虔”的观点，宣扬天父上帝为古今中外共同的独一真神，人人都得敬拜上帝；并谆谆告诫“勿拜邪神，须作正人”，具体地提出了“正道”的典范和反对“不正”的若干要求，即反对淫、忤父母、行杀害、为盗贼、为巫覡、为赌博以及吸洋烟、饮酒、堪舆、相命，等等。可见，这是洪秀全对世人在宗教信仰及道德修养方面的具体要求。《原道醒世训》着重谴责了“世道乖漓，人心浇薄，所爱所

憎，一出于私”的社会弊端；批判了国与国之间，省、府、州、县、乡、里，乃至族姓之间“相陵相夺相斗相杀”的丑恶现象；明确提出：“天下多男人，尽是兄弟之辈，天下多女子，尽是姊妹之群”，不应存“此疆彼界之私”，不应起“尔吞我并之念”；热烈歌颂了唐虞三代之世，“天下有无相恤，患难相救，门不闭户，道不拾遗，男女别涂，举贤上德”的“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”理想社会；号召天下凡间的兄弟姊妹，“跳出邪魔之鬼门，循行上帝之真道”，“相与作中流之砥柱，相与挽已倒之狂澜”，如此，则可“行见天下一家，共享太平”。显然，这是洪秀全提出的改造社会的理想方案。洪秀全用“大同”思想反对私有，显然是起着反封建的革命作用的。但是，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后怎么办？是废除一切私有制，还是保存农民私有制？对这个问题，洪秀全没有明确的回答，但是倾向性是很清楚的。他倾向于废除一切私有制，提出了“货不必藏于己，力不必为己”的口号。

不论作者主观意图如何，《原道救世歌》（原道醒世训）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，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。